

## 论周作人“为人生”的文学观在翻译中的实践

高 建 惠\*

<目 次>

I. 绪 言	2. 从为“人生”到为“人性”的推进
II. 作为翻译家的周作人	3. “为人生”文学观下的“直译”理论
III. 周作人“为人生”文学观下的 翻译实践	IV. 周作人“为人生”文学观下翻译 实践的特点
1. 外国文学翻译与“人”的发现	V. 结 论

### I. 绪 言

陈子善先生曾这样评价周作人：“在20世纪中国文史上，周作人是一个巨大而复杂的存在。<sup>1)</sup>”周作人的“巨大”和“复杂”首先在于其身份。周作人是鲁迅的胞弟，长期在鲁迅的阴影下，加上他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又有一段特殊的政治经历，长期以来学界对其文学成绩的重视程度和评价都受到影响。这种影响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才有所改观，周作人开始被认定为一个“巨大”的传统作家而得到学界的关注<sup>2)</sup>。事实上，周作人不仅是个“巨大”的作家，还是一位“巨大”的翻译家，外国文学翻译几乎占据了他整个文学活动的“半壁江山”。从20世纪初提笔到文革前夕最后的搁笔，都是翻译之作，即便是译作最

\* 水原大学中文系专任讲师

1) 徐舒虹,《五四时期周作人的文学理论》,学林出版社,1999,第1页。

2) 参考何亦聪,《近30年来周作人研究综述》,《河南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152页。

少的时期，他也写了很多介绍性或者是与翻译有关的文字。

本世纪初，随着比较文学翻译研究的热潮涌现，作为翻译“巨人”的周作人及其翻译思想也开始逐步得到重视，研究成果不断涌现<sup>3)</sup>。这些研究中不可避免要涉及到周作人的文学观，但对其评价却褒贬不一。周作人的“巨大”和“复杂”的第二点就在其文学观念上。至今学界对周作人文学观是进步还是保守，是积极还是消极的争论仍不绝于耳，甚至于以“左”还是“右”的简单政治立场来批判周作人文学观者尚有人在<sup>4)</sup>。站在政治功利主义的立场上审查周作人的文学观，从而得出其文学观“倒退”、“自闭”等功利主义的结论，是不公正的，特别是以周作人五四后“闭关自守”的文学创作来印证这种功利主义的结论就更加不可取了。

笔者尝试从占周作人“半壁江山”的翻译活动入手，从其翻译取向和翻译实践的角度来探讨周作人文学观念的形成、发展和影响，及其“为人生”的文学立场和人道主义文学思想在翻译中的实现。发现其文学观很难以政治功利的标准来衡量，人生、人性、人本、人道等“人”的文学观念才是其自始至终一以贯之的翻译标准。如此以来，周作人五四后受学界批评的所谓文学观转向的问题，就不能简单地被认定为周作人文学观的“倒退”，相反，在笔者看

3) 关于周作人翻译的先行研究主要集中在：第一，翻译实绩介绍，如张菊香，《周作人研究资料》(上·下)，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钱理群，《周作人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9月；张铁荣，《周作人平议》，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3月；最近的，华中科技大学陈洁2011年博士论文《周氏兄弟翻译活动比较研究》等等。第二，翻译思想的探讨，如杨莉，《周作人翻译思想的形成及其影响》，《译林》，2007年第4期；著作有，刘全福，《翻译家周作人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年4月等。第三，翻译本体的语言学研究，如颜一兰，湖南大学，2009年硕士论文《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观照下周作人《侠女奴》翻译研究》；西南财经大学林洁2011年的硕士论文《图里翻译规范理论下的周作人儿童文学翻译研究》；2010山东大学孟令娟硕士论文《从多元系统理论看周作人的早期翻译》等着眼于运用现代理论对周作人的翻译进行再发现。而曲阜师大冷晓霞硕士论文《周作人翻译和原创作品量词的应用研究》，以及2007年6月吉林大学于小植博士论文《周作人的文学翻译研究》等从语言学入手，直接进入周作人翻译的本体进行研究。可见，对周作人的翻译研究正逐渐成为一个新的热点，并开始向纵深发展。

4) 参考张铁荣，《周作人平议》，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3月。

来周作人“不退且进”，坚守其固有的文学观念，在时代大潮中始终保持独立的思考，同时矫枉纠偏，清醒地把握着现代文学的方向。由此可见，周作人对现代文学的文学本性积极推进的努力和实绩是应该得到认可和肯定的。

## II. 作为翻译家的周作人

周作人青年时代学了很多语种:英文、俄文、日文、希腊文,这些都为他日后的翻译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周作人的翻译活动最早开始于南京江南水师学堂读书时期,1904年他将英文本的《天方夜谭》中的〈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的故事翻译成《侠女奴》,由丁祖荫帮助发表在《女子世界》第1年的第8、9、11、12期,署名萍云女士,这可以说是周作人发表最早的翻译作品<sup>5)</sup>。《侠女奴》的发表可以说并没有什么影响,但对于周作人个人来说,却是日后阅读与翻译外国文学的开端。

30年代之前,他的白话文学翻译基本上是以杂和短为特色,即使是《狂言十番》也是10篇短小的狂言集合。进入30年代后,周作人的翻译逐渐改变翻译策略,开始以翻译专人专书为主,1937~1938年译的专书《希腊神话》虽然未出版,但预示着作为作家、教授的周作人开始向专职翻译家角色的转变。这一时期周作人的翻译成绩不算丰厚,主要有前期翻译的结集或增译后结集《儿童剧》和《希腊拟曲》。40年代前半期周作人的几部文集《药堂语录》、《药味集》、《药堂杂文》、《秉烛后谈》、《苦口甘口》、《立春以前》等作品中出现了不少谈论翻译的文章。人民共和国时期的翻译,始于《伊索寓言》,此书译自法国商伯利本,开始动手翻译在1950年3月13日。以后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翻译主要分为两类,一类属于偏重约稿任务型,当然也与翻译家的兴趣相契合,例如《伊索寓言》、《欧里庇得斯悲剧集》、《阿利斯托芬喜剧集》里的《财神》,以及《平家物语》等。另一类则是本人非

5) 刘全福,《翻译家周作人论·附录三·周作人译事年表》,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年4月,204页。

常看重，以很强的个人意向决定选目的，如《日本狂言选》、《浮世澡堂》、《希腊神话故事》，还有译者身后出版的《浮世理发馆》、《希腊神话》、《卢奇安对话集》等。两者兼而有之的也有，例如《古事记》，早年是因为喜欢和期望打破日本是所谓的“神国”神话翻译过一部分，后来楼适夷将旧作检出，请他译完了全书。

从数量上说，周作人翻译的希腊文学约有210万字，是他翻译文学中占比重最大的一部分。其中包括他在1918~1923年间翻译的霍夫达利阿蒂思等人的“新希腊”文学作品，以及从英文翻译过来的英国人着的希腊文学作品，如劳斯的《希腊的神与英雄》、威格尔着的《萨波传》等。周作人翻译的日本文学数量大约是171万字，包括日本近现代文学作品，还包括1960年完成但未问世的《日本狂言选》增订本(大约20万字)。第三类是其他欧洲国家的近现代文学作品，以及50年代从英译本转译的《乌克兰民间故事》和《俄罗斯民间故事》等，约计110万字<sup>6)</sup>。如此巨大数量的翻译可见周作人对翻译事业的敬业精神。同时，通过外国文学翻译周作人起到了为新文化运动奠基的作用，这种作用舒芜在《周作人评析·序言》中指出，周作人是五四时期公认的文艺启蒙大师和理论权威，不理解周作人就不能正确理解中国现代文学史<sup>7)</sup>。

### III. 周作人“为人生”文学观下的翻译实践

#### 1. 外国文学翻译与“人”的发现

1906年~1909年3月留日的周作人追随哥哥鲁迅文学救国的思想，与鲁迅共同筹办《新生》杂志，杂志提出了“为人生”的文学主张，并出版了《域外小说集》。初版16篇小说，周作人译13篇，1921年再版时扩充为37篇，周

6) 数量统计参见王友贵，《翻译家周作人》，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199页。

7) 李景彬，《周作人评析》，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第2页。

作人译34篇,从其承担的翻译任务来看,他的翻译抛弃了初期模仿林纾等译作的消遣性,以更加严肃的态度审视弱小民族的文学,这也是20世纪新文学的方向所在。同时,在翻译中周氏兄弟自觉改用直译,以反叛晚清译界删改泛滥的意译法,从而把文学真正纳入到“为人生的文学”的轨道上来,具有反思、改造国民性的启蒙意义。虽然《新生》杂志流产,《域外小说集》也只卖出了21本,但“新生”的精神一直延续了下来,它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别开一种新境界,展示了文学人道主义观念的大变革和现代小说的新质。

周作人从翻译文学中获得了“为人生”的文学观念,为自己的人道主义文学理论打下了根基,他最早提出“为人生的文学观”这一观念是在《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一文,这是1918年4月19日他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讲演,这之后才有文艺界“为人生的艺术”和“为艺术的艺术”之争。后在《人的文学》与《平民的文学》中他对这一观念做了阐释。1920年北大出版社结集出版了周作人五四时期的译作,名为《点滴》,在《点滴》中周作人同时收入了《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新文学的要求》三篇著名论文,对“为人生的文学”进行了更具体的说明,被他称为“人的文学”<sup>8)</sup>,即一种关注人性,主张文学的人性化的文学主张。周作人的“人的文学”一提出即掀起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大幕,赋予新文学人本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新内涵。周作人在五四高扬狂热的理想主义精神的时代,在“人的文学”中,表现了非中扬西,全盘否定的思想,现在看来未免偏激,但这恰恰是新文化先驱者和启蒙者们的共同思想所在——“人”的观念的发现,人道主义精神的启蒙。周作人在《点滴·序》中也明确说明:

“这些并非同派的小说中间,却仍有一种共通的精神,——这便是人道主义的思想。……这大同小异的人道主义思想,实在是现代文学的特殊。因为一个固定的模型底下的统一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堪的;所以这多面多样的人道主义的文学,正是真正的理想的文学。”<sup>9)</sup>

8) 周作人,《人的文学》,周作人着,止庵校订《周作人自编文集·艺术与生活》,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第8页。

的确，就周作人毕生的译作来看，可以说人道主义的思想贯穿了他翻译选题的始终，因为在他看来，只有人道主义才真正代表了理想的现代文学的根本特征<sup>10)</sup>。他一生翻译文学数量种类众多，从对弱小民族文学的关注，到日本、希腊、欧洲文学的翻译，在其翻译实践中，这些文学理论都得到了很好的落实和发展。无论时代风潮如何变化，周作人一直矢志不渝坚守着“人”的信念，并不断地丰富发展它的内涵，在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推进中彰显出独特的文化意义。

周作人“为人生”的文学思想在翻译上早期主要表现为对“弱小民族文学”的关注以及翻译。在南京求学时期的周作人和当时的大多数青年一样，很受梁启超、林琴南的影响，醉心于文学的游戏与消遣性。1906年初到东京后，弥漫于东京留学生中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使得周作人将眼光转向与中国一样处于帝国主义压迫下的东方弱小国家。但据周作人回忆，

“那时我的志趣乃在所谓大陆文学，或是弱小民族文学，不过借英文做个居中传话的媒婆而已。……俄国不算弱小，其时正是专制与革命对抗的时候，中国人自然就引为同病的朋友，弱小民族盖是后起的名称，实在我们所喜欢的乃是被压迫的民族之文学耳。”<sup>11)</sup>

表现出其人道主义的思想。在这些“弱小民族的文学”中俄罗斯文学深深吸引了周作人。他译了斯蒂普虐克、阿·托尔斯泰、库普林、迦尔洵、索洛古勃、安德列耶夫、柯罗连科、列夫·托尔斯泰、丹钦柯、弥里珍那等十多位俄罗斯作家的小说、寓言和故事。除此以外，还有我们熟知的普希金、莱蒙托夫、赫尔岑、屠格涅夫、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茹科夫斯基等。同时，在他的笔下论及的俄罗斯作家和文艺理论家达二十多

9) 周作人，〈点滴·序〉，张菊香，〈周作人研究资料〉(上)，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303页。

10) 刘全福，〈翻译家周作人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年4月，160页。

11) 周作人，〈东京的书店〉，周作人着，止庵校订《周作人自编文集·瓜豆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71页。

位,周作人说,他们的作品有时可以十年不读,也不会忘记。周作人之所以对俄国文学如此重视,其原因可以在他1920年11北京师范学校的演讲中找到答案。演讲的名字是<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他认为,俄国文学的特色是“社会的、人生的”,“俄国近代的文学可以称作理想的写实派的文学;文学的本领原来在于表现及解释人生,在这一点上俄国的文学可以不愧称为真的文学了。<sup>12)</sup>”从俄罗斯文学作品中,周作人看到的是人道主义思想。他认为,人道主义是俄罗斯小说的共同之处,无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还是梭罗古勃,都是人道主义作家。他指出:“托尔斯泰的博爱与无抵抗,固然是人道主义,梭罗古勃的死亡赞美,也不能不说是人道主义”<sup>13)</sup>。“俄国陀思妥也夫斯基是伟大的人道主义的作家。<sup>14)</sup>”他归纳道:“他们只承认单位是我,总数是人类,人类的问题的总解决也便包涵我在内,我的问题的解决,也便是那个大解决的初步了。<sup>15)</sup>”

当然俄罗斯文学的译介在周作人早期对“弱小民族文学”的翻译活动中并非全部,他还关注波兰、匈牙利等东欧弱小国家民族的文学。据不完全统计五四前后,他翻译的弱小国家和民族的作家、作品达到26人约60余部,其中波兰小说有14篇,而波兰作家显克微支是其最爱,单翻译他的小说就占翻译全部波兰小说的一半。除此外匈牙利作家育珂摩尔、芬兰的哀禾、丹麦的勃兰兑斯等都是周作人重点介绍的作家,也是对周作人的翻译思想产生重要影响的作家。通过这些作品的翻译,周作人对文学独立性和文学个性的主张走在了时代的前列,“弱小民族的文学”也突破了时代和民族的局限而成为其“人的文学”中具有独特意义的一部分。

周作人一生高举“人”的大旗,“人”的发现是周作人对现代中国和文化的最贡献。那么周作人对“人”的理解是怎样的呢?方习文在<周作人的人学

12) 周作人, <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 周作人着, 止庵校订《周作人自编文集·艺术与生活》,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年1月, 68页。

13) 周作人, <点滴·序>, 张菊香, 《周作人研究资料》(上),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6年11月, 303页。

14) 同上

15) 同上

观>中认为周作人的“人”论突破了“灵肉二元论”以及“灵肉合一论”的框架，是一种“灵肉一元论，具有现代启蒙性的意义<sup>16)</sup>。从周作人的文论中可见，他认为“人的生活的基础依旧还是动物的，正如西儒所说过，要想成为健全的人必须先成为健全的动物，不幸人们数典忘祖，站直了之后增加了伶俐却损失了健全”<sup>17)</sup>。人又是进化的动物，“我们相信人类以动物的生活为生存的基础，而其内面生活，却渐与动物相远”<sup>18)</sup>。他肯定人的基本欲望和向善的追求，“我们相信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善的，应得到完全满足。凡有违反人性不自然的习惯制度，都应该排斥改正”。从“人”出发，周作人怀疑一切的“神”，自称“少信的人”<sup>19)</sup>，思想和行为处处体现出爱真实，疾虚妄的实事求是精神。可见周作人对“人”的理解最初就是建立在人本主义的基础之上的，这种人性的观念遇到五四启蒙主义的大潮的时候，周作人把人性与时代结合，提出“为人生”的文学观念，并通过“弱小民族文学”的翻译，推进了启蒙思想的传播。但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深入，“为人生”逐渐变成文学界的一个政治标语和口号，这时周作人再次独辟蹊径，选择抛弃“为人生”文学的功利性，坚持其以人为本的文学性。

## 2. 从为“人生”到为“人性”的推进

1920年1月6日在题为<新文学的要求>的讲演中，他首先批评了文学的两种倾向：即文学的艺术派和文学的人生派。他反对“为艺术的艺术”，原因在于重技工而轻情思，妨碍自己表现的目的，甚至以人生为艺术而存在，这是他所不能接受的。但与此同时，他也指出为人生的艺术派的弊端：“人生派说艺

16) 方习文，〈周作人的人学观〉，《喙伦贝尔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46-47页。

17) 周作人，〈蠕范〉，周作人着，止庵校订《周作人自编文集·夜读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183页。

18) 周作人，〈人的文学〉，周作人着，止庵校订《周作人自编文集·艺术与生活》，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10页。

19) 周作人，〈新文学的要求〉，周作人着，止庵校订《周作人自编文集·艺术与生活》，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20页。



术要与人生相关,不承认有与人生脱离关系的艺术。这派的流弊,是容易讲到功利里边去,以文艺为伦理的工具,变成一种坛上的说教。<sup>20)</sup>”周作人意识到了这一提法的强烈社会功利性,从而提出一种“人生的艺术派”的主张,

“我以为文艺是以表现个人情思为主因其情思之纯与表现之精工,引起他人之感激与欣赏,乃是当然的结果而非第一的目的。我想现在讲文艺,第一重要是‘个人的解放’,其余的主义可以随便人家分类的说来,可以说这是个人主义的文艺,然而我相信文艺的本质是如此的,而且是这个人的文艺也即真正的人类的——所谓人道主义的文艺。<sup>21)</sup>”

在功利性的时代大潮中,提出文学非功利性的观点,周作人可谓“逆流而上”,由一位五四新文学运动的领袖人物逐渐转变成为一名冷眼旁观者,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攻击与批判。表面上看起来周作人似乎与新文学背道而驰,越行越远,走上了一条“歧途异路”,但从他的翻译实践来看,他不仅没有背离文学“为人生”的轨道,反而推动了“为人生”文学的进步和发展,他分化了“为人生”文学观中历史的“个人”,更加突出了为人性的“个人”部分,坚定了“为人生”的文学观点中从人性出发的基本立场,在人道主义文学的观念上向前推进了一步,使其抛开了狭隘的民族主义,更加贴近人道主义文学观念的核心。对于这个新的认识,他在演讲中做了明确的说明,

“人生的文学是怎样的呢?据我的意见,可以分作两项说明:一,这文学是人性的;不是兽性的,也不是神性的。二,这文学是人类的,也是个人的;却不是种族的,国家的,乡土及家族的<sup>22)</sup>”。

同时,他认为“这新时代的文学家,是‘偶像破坏者’,但他还有他的新宗

---

20) 周作人,同上,18页。

21) 周作人,《文学的讨论》,见《晨报副刊》,1922年2月8日。

22) 周作人,《新文学的要求》,周作人著,止庵校订,《周作人自编文集·艺术与生  
活》,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19页。

教——人道主义的理想是他的信仰，人类的意志便是他的神<sup>23)</sup>”。“人”和“人类”的概念在周作人思想中有所混同，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特别是在五四人文思想启蒙时期，矫枉过正，个人的小“人生”与“种族”、“国家”、“乡土和家族”的大“人生”难分你我，这次讲演周作人就进行了辨别，明确其为人性与为人类的泛文学立场，否定了狭隘的民族主义文学观，表现出其对以人为本观念坚持的态度。

这一时期在文学功利性上有所“后退”的周作人，在翻译上表现地相当积极，特别是对日本文学和希腊文学的翻译和介绍，以日本和希腊文学中健全的人性、人情作为其“为人生”的文学翻译观的一种诠释，开始从翻译的严肃性转向趣味性，以此表现其坚持文学和翻译的人本主义方向的立场。1925年周作人把五四后期的翻译结集《陀螺》，这是一部东西方、古近代的杂集，分为“希腊小篇”、“杂译诗”、“法兰西小篇”和“日本小篇”四大块。之所以用《陀螺》做书名，他解释到“我用陀螺做这本小书的名字，并不因为这是中国固有的旧物，我只觉得陀螺是一件很有趣的玩具。<sup>24)</sup>”由此，《陀螺》集重新强调了文学的游戏性，为新文学的发展展示一个新的方向，使新文学对人的文学、人道主义精神有了更宽泛的界定。30年代以后周作人对希腊文学和日本文学的翻译成果也使其成为中国希腊文学与日本文学翻译的开拓者，这种对新文学翻译方向的自主选择，彰显了其独立的个性和自由的精神，从客观上看，巩固和坚守了新文化“人的文学”的思想，并在新时期为“人”和“人生”做出了新的诠释。

#### 1) 日本文学翻译中的“人情”

周作人曾说“我的杂学如上所记，有大部分是从外国得来的，以英文与日文为媒介，这里分析起来，大抵从西洋来的属于知的方面，从日本来的属于情的方面为多。<sup>25)</sup>”所谓“知”当属五四时期对“人”的发现和启蒙思想，而所谓

23) 周作人，同上，23页。

24) 周作人，〈陀螺·序〉，张菊香，〈周作人研究资料〉(上)，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305页。

“情”当属五四之后对“人”的深入理解。在这种“人情”观念下，周作人对日本传统文学的翻译，不再以其“进步性”为准，而是以其民间意识、艺术品格、艺术个性为准。就日本经典文学的翻译来看，周作人的翻译成就斐然，如《狂言十番》、《日本狂言选》、《浮世澡堂》、《浮世理发馆》、《平家物语》、《古事记》、《枕草子》、《徒然草》(部分)等别具个性与价值。这些日本文学译作中平民文学占三分之二，贵族文学占三分之一。周作人首先从人“情”的视角出发，以健康人性和文学游戏性的思想肯定了日本俗文学，把它们看作正常人性、健全人生的需要，如式亭三马是平民文学滑稽本创作的杰出代表之一，周作人对他的《浮世澡堂》非常感兴趣，他于1955年把它译出，为竭力保持原来的意味，再译文中加入了600条注释，此外还对书中涉及的澡堂、落语和武士这些不易为国人理解的民间的独特文化风情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可见其对政治畸形文学纠偏和反叛的深意所在。

对贵族文学的认识周作人经历了一个过程，在1919年《平民的文学》一文中他把普遍与真挚的“人情”表现作为区别平民与贵族文学的标准，但当“反对贵族文学”口号使这一标准成为新文学运动的政治意识以后，周作人对此产生了怀疑。在1922年发表的《贵族的与平民的》一文中，他重新审视了贵族文学中超越现代的精神，对平民文学中的现世功利性不满，希望二者能调和成一种中和的文学。1928年在中法大学的演讲《文学的贵族性》中，他再次提出平民与贵族的文学从文学的角度看根本无法分，也根本不必分。像对平民文学一样，他发现并赞赏贵族文学自然真挚的感情，他在1924~1926年间就选译了兼好法师的《徒然草》，同时开始翻译《古事记》。《古事记》是日本第一部古书，由安万侣整理记录，是日本古史和上代神话传说的混合，表现的是国家精神和英雄精神，周作人却独具慧眼发现了它的文学情趣之美，他在《〈古事记〉引言》中说：“《古事记》的价值，不在作为一部史书上，它的真价乃是作为文学书来看。”<sup>26)</sup>60年代周作人将《古事记》全本译出，同时还

25)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群众出版社，1999年1月，630页。

26) (日)安万侣着，周作人译，《古事记·引言》，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0年12月。

将清少纳言的《枕草子》全本译出。《枕草子》是日本最早的随笔文学，与《徒然草》共称日本随笔文学的双璧，可称得上是“纯粹”的贵族风情作品，60年代失去言说权的周作人以自己的翻译文学再次展现了人生本身的丰富性，艺术表现和审美的多样性和独特性，这恰恰成为他最好的言说，也是一个具有独立思考能力、人文主义精神的翻译家、思想家对阻碍文学发展的政治强势话语模式的又一次反拨。

对于现代日本文学周作人同样给予关注并认为他们具有一种人的“特别精神”，这种特别的精神与他的“人的文学”的观念不谋而合。他关于日本现代文学的译作形成了一个庞杂的体系，其中包括各种流派数十位作家及诗人的文艺理论专著、各种体裁的小说与诗歌等，而有关日本文学研究与介绍方面的文章他一生曾发表过60余篇，如《日本近三十年来小说之发达》、《闲话日本文学》和《明治文学之追忆》三篇及《日本的诗歌》、《日本的小诗》和《日本的讽刺诗》等。1918年发表的《日本近三十年来小说之发达》就是一篇对现代日本文学进行详细梳理的力作。他提出中国小说要求得新的发展，就必须像日本明治初期那样从头做起，尽快学会如何模仿别人。随即周作人身体力行写了《人的文学》，可见他对日本现代文学的翻译并未脱离“人的文学”的思想。武者小路是周作人介绍的第一位日本作家，而且还是当时日本文学及思想界一位颇有影响的人物，周作人为其狂热的理想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所折服，不仅介绍了他这个人，同时热情的把以他为代表的“白桦”这一著名的现代日本文学流派，以及武者小路所倡导的“新村”思想介绍到了国内，还一连写下7篇文章为“新村”热烈的鼓吹。新村运动的影响表现在1923年初版的《现代日本小说集》中，其译作中自由、人道、边缘的文学精神更加加强了。书中共收15位作家的30篇小说，鲁迅译6人11篇，周作人译9人19篇，近代重要作家的作品几乎都有入选。这是白话文译的第一部日本现代短篇小说集，也是二周系统介绍日本小说的创始之举，具有奠基的重大意义。周作人1922—1926年译的日本现代作品《两条血痕》继续《现代日本小说集》的思路，更加张扬个性化、多样化的风格，努力使文学摆脱政治束缚而恢复自然本性。这是周作人译日本现代小说的最后一个集子，也是他译域外现代小说的最后一个集子，

对健康人性追求的热情丝毫不减。

## 2) 希腊文学翻译中的“人话”

周作人之所以关注希腊文学,原因在于希腊是欧洲文明的源头,是人性的发端,无论是在欧洲文学史还是在世界文学史上,希腊都是极其重要的一笔。在周作人看来,

“希腊文化,为欧洲先进,罗马以来,诸国典章文物无不被其流泽,而文艺学术为尤最。故言欧洲文学变迁,必溯源于希腊。虽种族时地,各有等差,情思发见,亦自殊别,唯人性本原,初无二致,希腊思想为世间法之代表,与出世间法之基督教,递相推移,造成时代。世之论欧洲文明者,谓本于二希,即希腊与希伯来思想,史家所谓人性二元是也。物质精神二重关系,为人生根本,个人与民族皆所同具。唯性有偏至,则所见亦倚于一端。故希伯来思想为灵之宗教,希腊则以体为重,其所吁求,一为天国未来之福,一则人世现在之乐也。<sup>27)</sup>”

希腊文学作为“人性二元”之一,有一种特有的希腊精神为周作人所看重,那就是求知、求真、求美的精神,这是一种超功利的现世人生态度,是以个人为本位的独立、自由、质疑、反叛的精神境界,也是与他的人生观念相契合的。

周作人在翻译中极力展现和渲染人性化的“希腊精神”,在他的译作中这种精神也自然而然地流露了出来,特别是被称为“人话”的希腊神话的介绍和翻译。周作人对希腊文学的翻译介绍始于1910年的《古希腊之小说》,在其后的20年间,他既自己着文对古希腊和新希腊的文学进行介绍,同时也直接翻译了大量诗歌、小说、拟曲,还翻译了一些其他国家的学者介绍希腊文学的文章,如《异域文谈》、《新希腊与中国》、《神话与传说》、《希腊的小诗》、《希腊女诗人》等。

27) 周作人着,止庵校订《周作人自编文集·欧洲文学史(第一卷)之希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55页。

对希腊文学周作人最重视的是希腊神话，希腊神话可以说是希腊文学中最具人性化的“希腊精神”的文学。在希腊神话中有一个著名的斯芬克斯之谜，其谜底就是“人”，希腊神话中神的形象也独具特色，他们并非高高在上，而是生活在人间，其特点是神和人不分，甚至连外形和性情都与人无异，它显示出希腊神话独具一格，对人的发现和张扬的特质。由于这种肯定人性，颠覆神性权威的意识，希腊神话历来被称为“人话”，同样也是这一点激起了周作人译介希腊神话的冲动。他于1937、1944、1951年三次翻译希腊神话原典，甚至在最后拟订的遗嘱里说：

“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惟暮年来所译希腊神话是五十年来的心愿，识者自当知之。<sup>28)</sup>”

这是对希腊精神的内在认同和张扬。在这段时间里，他还着文对古希腊神话和古希腊神话学者进行大力介绍，发表了<习俗与神话>、<希腊神话>（一、二）、<希腊的神·英雄·人>，另外还有<希腊人的好学>、<希腊的余光>等。新中国成立后周作人继续从事他所喜爱的希腊文学译介工作，主要与罗念孙合译了多部希腊悲剧和喜剧，后结集为《阿里斯托芬喜剧集》、《欧里庇得斯悲剧集》，另外还发表了译着《希腊的神与英雄》、《希腊神话引言》等。

实际上，长期以来，甚至迄今为止，中国对希腊文学与文化介绍方面做出卓越成绩的人也并不是很多，真正从希腊原文、原典进行翻译介绍的人就更是少之又少，而周作人正是在这一严格划分中，做出成绩最早，成就也相当可观的一个。如果说对西方现代名家名作的翻译和对弱小民族作家作品的翻译体现了周作人译作的时代共性，那么对希腊文学的翻译就体现了他的独特个性。周作人作为一个民俗学家兼翻译家，对题材的选择自有其不同之处，他立足于人道主义，正视民间文学独特的人性，以人道主义的精神去发现文学，无疑是中国近现代翻译史上一个独特观点。

28) 钱理群，《周作人传》，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9月版，582页。

### 3. “为人生”文学观下的“直译”理论

从《域外小说集》的翻译开始,在周作人看来,翻译的目的,不是取悦国人,而是传达异域文化的实质,而这实质,就与中国故有的传统大相异趣。所以,倘能原原本本地将洋人的思想译出,对国人的思维习惯,将有一种冲击,这恰恰是他期盼的。由此,周作人本着“为人生”和“人的文学”思想传播的意图,在翻译理论上提倡并坚持“直译”的主张。他认为,

“文字本经我手,意思则是我所喜欢的,要想而想不到,欲说而说不出的东西,固然并不想霸占,觉得未始不可借用”<sup>29)</sup>。

周作人所“借用”的“意思”如上所述都是关于“人生”、关于人性的人道主义的文学思想,这些思想不经歪曲,直接被周作人拿到中国来,为中国所用,说明他一直有意识的把翻译作为传达自己思想观点的一种方式,所以在翻译理论上他一直强调“直译”的方法。

周作人“直译”的理论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最初他在1913年给《小说月报》的投稿信中对翻译的方法问题使用的是“对译”的概念而非“直译”,后来1917年的《〈古诗今译〉题记》、1918年的《文学改良与孔教》、1920年的《点滴·序》中,才鲜明地论述了自己的直译观。到1925年6月12日《〈陀螺〉序》发表后,他的直译理论最终成熟起来。在这篇序言中,周氏主要从三方面阐述自己的“直译”理论,具体表现如下:一是对“直译”内涵的界定。周氏认为,从汉语表达能力来看,许多译名无法得到对应。这一方面要求译者尽可能用汉字现有表现手法传达原文意思;另一方面,对于汉语中没有的表现手法,应尽量从原语中吸收,即所谓“欧化”,从而为汉语输入新的表现方式,增加其表现能力。二是对于“直译”外延的界定。周氏提倡的直译,不是一字一字地将原文换成汉语,而是更高层次,即句和段层次上的对应,这和意译

29) 周作人,《永日集·序》,张菊香,《周作人研究资料(上)》,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11,179页。

很相似。但“直译”和意译又不完全相同，直译尽量保持原语的语言文化习俗，而不像意译那样太多的变通。三是对于“直译”标准的界定。周作人在《〈陀螺〉序》中认为他的“直译”就是“信与达”，而不提“雅”字，并且说“信达雅”是“有些天才”的人能够达到的，这其实已经否定了翻译中求雅的可行性。纵观周作人的译论形成轨迹，我们可以明显看到他逐步由崇拜、模仿林纾、严复等人提倡之“雅”到抛弃“求雅”，转而求文学思想传达之“信”和“实”的一个独创新论的过程。

在这种直译主张下，周作人早年的文言直译作品读起来晦涩难懂，但达到了其保持原作真实面目的目的。到了后来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他翻译作品的语言已经改为白话，但仍然是直译的。1918年，在他的《文学的改良与孔教》中他谈到：“我以为此后译本……当竭力保存原作的风气习惯，语言条理，最好还是逐字译，不得已也要逐句译，宁可中不像中，西不像西，不必改头换面。<sup>30)</sup>”需要补充说明的一点是，周作人的这种直译观是在改变人生观念的“译经意识”下提出的一种严肃的文学翻译主张。1908年，周作人在日本立教大学学习希腊文，其雄心就是要翻译《新约》，后来虽然这一计划没能实现，但严肃的“译经意识”一直对他的文学翻译发生着潜在的影响，其意图是通过外国文学的引介来改造中华思想和文学，是想要借用外来的文化给羸弱的中华民族输入新鲜的血液，由此可见周作人坚持“直译”观的意义所在。

最终翻译实践证明，周作人的直译是很出色的，受到过不少人的褒奖，1919年《新青年》上发表了钱玄同〈关于新文学的三件要事〉的通信，信中这样写到：

“周启明君翻译的外国小说，照原文直译，不敢少以已变更。他既不用那‘达旨’的办法，借外国人学说中国话的调子，尤不屑象那‘清室举人’的办法，叫外国文人都变成蒲松龄的不通徒弟，我以为他在中国近年的翻译界中，是开新纪元的。<sup>31)</sup>”

30) 周作人，〈文学的改良与孔教〉，《新青年》第5卷第6号，1918年12月15日。

31) 钱玄同，〈关于新文学的三件要事〉，《新青年》第6卷6号，1919年12月。



1922年,胡适在他的名文《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里认为1918年的文学革命,在建设方面,有两件事可记,一是“白话诗的试验”,二是“欧洲新文学的提倡”,后者以“周作人的成绩最好。他用的是直译的方法,严格的尽量保全原文的文法与口气。这种译法,近年来很有人仿效,是国语的欧化的一个起点。<sup>32)</sup>”这无疑是对周作人翻译工作的高度评价。钱理群也在《周作人论》指出,在中国现代翻译史上,译作能够自成独立艺术世界的翻译家是不多的,周作人即是其中最杰出者之一;以日本古典文学和古希腊文学作品的翻译为例,就表现出了周作人在寻求与自己主观心灵相契合的目标时所独具的慧眼;周作人以他优美的译笔,沟通了中国读者与在时空上迥然不同的国家的原作者的心灵,同时又提高了翻译文学的独立地位与价值,这都构成了周作人在中国现代翻译史上的独特贡献<sup>33)</sup>,等等不一而足。

#### IV. 周作人“为人生”文学观下翻译实践的特点

周作人通过翻译传达自己“为人生”的人道主义思想,这种思想在其翻译实践中表现为以下几个独特之处:

1. 介绍与翻译并举。周作人不仅通过翻译外国文学的作品上传达自己的人道主义思想,而且通过介绍和研究辅助翻译传达思想。在中国人对外国文学的了解还相当有限的情况下,这种介绍与研究的作用与直接的翻译文学作品同样重要。周作人写的介绍外国文学的文章中,希腊文学、日本文学、欧洲文学都有涉及,同时,他也常常在自己的读书札记或随笔中介绍外国作家生平创作、外国的文学理论、文化现象等,这些具有一定深度又比较轻松的介绍性文章,为当时相对闭塞的中国读者打开了一片新天地,对于传播人道主义思想所起到的启蒙之功是不容忽视的。

32)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文存》第2集,台北远东图书公司,1961,250页。

33) 钱理群,同上书,238页。

2. 个性化的翻译选本。周作人从人道主义思想出发，围绕着对“人”的理解与认识，将个人的知识触角伸展到了相当广阔的领域：道德观念起源发达史、生物学、性心理学、儿童文学、童话学、民俗学等等，这种广泛的涉猎使周作人获得了一次精神的洗礼。他立足于人性解放的精神，适应中国时代潮流的发展，从对“弱小民族文学”的翻译选择，到对具有健全人性、自由反叛精神的日本文学和希腊文学的翻译选择，旗帜鲜明地传达出自己的文学主张与人性思想。除此以外，周作人还独具慧眼地把视角放到了儿童文学上，正视儿童独特的人性，译介了一大批儿童文学，如王尔德童话《安乐王子》、安徒生童话《卖火柴的女儿》等。还写了很多阐述自己童话观、民间文学观和儿童教育观的文章，如《童话研究》、《童话略论》、《儿童的文学》、《儿童文学小论》等。这种以“立人”的精神发现儿童的视角，无疑又是中国近现代翻译史上一个独特观点。

3. 理论在翻译中贯穿。通过翻译作品的选择和介绍传达人道主义思想之外，周作人同时强调翻译理论的建设，以此作为翻译作品的补充和完善。周作人是那个时代的翻译家中不多见的对翻译理论投入如此多兴趣和精力的人之一，他的翻译理论与他的翻译实践也是紧密相关。除去他对直译主张的细致梳理和表述，周作人还提出了一些翻译的具体原则，如关于人名地名的翻译原则中，他提出了著名的“名从主人”原则。直到如今，“名从主人”还是大多数场合专有名词翻译须遵循的最主要原则，这是周作人对翻译理论的重大贡献之一。在1920年发表的《翻译和批评》一文中，周作人还特别提出翻译批评和重译的问题，强调了对文化负责任的态度。1951年《翻译通报》2卷6期上周作人发表了《翻译四题》一文，对建国后翻译中长期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自己长期坚持且相当有见地的主张。此外，他对新时期编写中国翻译史，外语词典，编订翻译计划，翻译事业的组织工作都提出了独到的真知灼见，其中大部分都是具有开拓性和现实意义的，同时这些翻译理论都是与其关注人性，以人为本的翻译思想密不可分的。

## V. 结论

周作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鲜有的以文学创作和翻译实践两方面都取得重要成就的大家,在文学创作方面,与其兄鲁迅共举“为人生”的理论旗帜,倡导为人生的文学,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相呼应;在翻译理论方面,将“为人生”的理论贯彻其中,付诸实践,体现为将翻译的着眼点放在弱小民族或底层受压迫的民众上面,传达普罗大众的感情,强调直译,就是为了更准确传达国外文学的原汁原味,为了不削弱这种弱小民众的挣扎与反抗的力量。在此基础上,周作人更是将“为人生”的理论推进一步,没有停留在左翼文学的功利主义的层面,而是将关注点转向了个人,在个体更细密更具体的表达上面,具体表现在日本文学翻译中的“人情”化叙述和希腊文学翻译上的“人话”表达,如果说周作人的这种翻译实践导向一种个人主义的消极和堕落,笔者更愿意认为这是他“为人生”的文学观在翻译实践中的发展,是一种积极的“堕落”。

周作人是一位文学家,同时是一位翻译家,如此我们才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周作人翻译的功用。对于周作人而言,翻译和创作是他表达情感的两翼,缺一不可,他一直有意识的把翻译作为传达自己“为人生”思想观点的一种方式。在知识分子际逢“乱世”的“五四”时期,对国家、个人当下之生存状态的感慨和忧愤使文人们言说的需要和愿望非常强烈,翻译和写作交替成为他们言说和宣泄的方式。在这些作译并举的时代巨人之中,周作人是最具特色的一位,无论时代风云、人生际遇如何变幻,“为人生”的人道主义思想始终贯穿其翻译和研究中,使其在时代潮流中独树一帜,其翻译文学的成就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功不可没,这一点应该得到毫无争议地肯定。

### <参考文献>

罗新章,《翻译论集》,商务印书馆,1984年5月。

- 张菊香,《周作人研究资料》(上·下),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
- 罗钢,〈周作人的文艺观与西方人道主义思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7年第12期。
- 钱理群,《周作人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9月。
- 张铁荣,《周作人平议》,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3月。
- 钟叔河主编,《周作人文类编·人的文学》,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3月。
- 徐舒虹,《五四时期周作人的文学理论》,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群众出版社,1999年1月。
- 张菊香、张铁荣,《周作人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
- 周作人着,止庵校订《周作人自编文集·艺术与生活》,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
- 周作人着,止庵校订《周作人自编文集·欧洲文学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
- 周作人着,止庵校订《周作人自编文集·夜读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
- 周作人着,止庵校订《周作人自编文集·瓜豆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
- 黄昌勇,〈从“为人生的艺术”到“为艺术的艺术”——周作人文学观念变迁轨迹之描述〉,《河北学刊》,2002年第2期。
- 温儒敏,《新文学的现实主义的流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
- 杨莉,〈周作人翻译思想的形成及其影响〉,《译林》,2007年第4期。
- 刘全福,《翻译家周作人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年4月。
- 于小植,《周作人的文学翻译研究》,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6月。
- 刘洋,〈传统的西方言说——论周作人“人学”思想〉,《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
- 方习文,〈周作人的人学观〉,《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
- 于小植,〈“启蒙”的淡化与反拨:周作人对功利翻译观的超越〉,《求是学刊》,2012年第3期。

<Abstract>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of 20th century, Zhou Zuoren(周作人)is not only a 'huge' writer, but also a 'huge' translator whose foreign literature translation occupies almost half of his entire literary activities. In this article, I attempt to start the analysis of Zhou Zuoren's foreign literature translation, and try to explore the formation, development and impact of his literary concept from his orientation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as well as the reflection of his literary view of “art-for-life(为人生)” and humanitarian thought in translation. As a conclusion, I believe that it is difficult to measure his literary view by the political standards, the literary concept of life, human nature, humanity are the only standard throughout his translation.

Key Words : 周作人(Zhou Zuoren), 为人生(art-for-life), 人的文学(human literature), 直译(literal translation)

